

考克斯对新的世界秩序的探索

李 滨^{*}

【内容提要】 罗伯特·W. 考克斯是西方近几十年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尽管他本人不愿承认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建构的历史结构分析框架是近三十年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最具创新的理论框架，影响了一批国际关系的年轻学者。他的理论开创了国际关系的批判理论先河，在其后期的学术生涯中，他始终在探索世界秩序变革的动因，倡导文明互鉴共存，相互促进，追求一种公正的世界秩序。本文悼念考克斯逝世，回顾了他一生的成长经历，以及他的学术思想与他的经历的相关性。

【关键词】 罗伯特·W. 考克斯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 批判理论

2018年10月9日，国际关系学界著名的学者罗伯特·W. 考克斯（Robert Warburton Cox，1926年9月18日—2018年10月9日）逝世。虽然这位近几十年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学者的去世没有在学界引起关注，但是，他那最具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将是永远留在学界的一份宝贵思想财富。作为一个多年研究和关注他思想的中国学者，笔者特以此文来纪念这位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巨擘。

罗伯特·W. 考克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具有重要影响。他被列入西方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50位国

^{*} 李滨，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同济特聘教授。

际关系思想家之一^①，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界的所谓“七贤人”之一，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英国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②，也被视为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首要开创者之一^③。考克斯多年来一直处于批判理论的前沿，并且在学术上影响了越来越多的学者，这些学者形成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学派；而且由于考克斯在批判理论上的开创性研究^④，使得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出现了一个不同于占主流地位的，尤其是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的替代理论。^⑤

由于考克斯的理论与思想中历史唯物主义色彩太重，作为国际关系主流的美国学界一些人对他评价不高，也不熟悉。可以说，他整体上在美国影响不大。尽管如此，考克斯的影响依旧不容低估，他的学术思想“不仅在国际关系学科上留下了印记，而且在产业关系、社会与政治思想、政治经济学以及文明研究上都留下了印记”。他的历史主义方法给“许多学者以启示，特别是年轻学者，并且继续影响着世界各地（国际研究学者）的研究议题”^⑥。即使考克斯在美国受到主流学者一定的排斥，但在美国近三十年来出现的建构主义理论中，还是可以看到考克斯理论的影子。比如，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的建构理论中可以见到考克斯一些思想的影响，如“解决问题的理论”与“批判理论”的划分，“理论总是为某些人服务和服务于某些目的”的思想。^⑦但在欧洲以及加拿大，考克斯拥有大量的拥趸，影响了一大批批判学者。可以说，在国际关系学界谈到批判理论，必然要谈到考克斯，把他视为开拓了国际关系研究视野，开创不同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范式，致力于改造与解放旨趣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先

① Martin Griffiths, Steven C. Roach and M. Scott Solomon, *Fifty Key Think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② 在本杰明·J. 科恩（Benjamin J. Cohen）所著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中，考克斯被认为是英国学派中仅次于苏珊·斯特兰奇的二号代表人物，见本杰明·J. 科恩：《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杨毅、钟飞腾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3、92页。

③ Richard Jones, ed., *Critical 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1, p. 2.

④ 主要是指他在《千禧年》发表的两篇论文：1981年的《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和1983年《葛兰西、霸权和国际关系》。

⑤ Martin Griffiths, Steven C. Roach and M. Scott Solomon, *Fifty Key Think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63.

⑥ Stephen Gill and James Mittelman, eds,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xvii - xviii.

⑦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0. 在温特早期的作品中，如在“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tate”一文中，温特就引用了考克斯的生产国际化和国家的国际化的思想，参见 Alexander Wendt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t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8, no. 2, 1994, p. 393.

驱。随着全球化产生的社会与经济危机不断出现，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考克斯的思想和理论在欧洲和加拿大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2014年，国际研究学会（ISA）授予考克斯理论领域杰出贡献奖。

一 考克斯的早期成长阶段

每一个学者的世界观与其个人经历、学习有着密切的关联。考察考克斯的理论 with 思想形成必须要了解其个人的成长环境 with 学习历程。

考克斯1926年9月18日出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的一个保守而相对富裕的英国后裔家庭。其父亲家庭是来自英国的移民，母亲家庭是来自北爱尔兰的移民。但父母都是新教徒。在考克斯青少年时代，他的家庭与他生活的蒙特利尔都经历着重大的变故。

作为英国前殖民地，加拿大在1926年获得外交独立权，1931年获得议会主权（但没有修宪权）。在这一过程中，加拿大也在逐步脱离对英国的依赖，向着与美国加强政治经济依赖的方向过渡。在这一过程中，加拿大内部存在着亲英的保守势力与倾向美国的自由势力的矛盾。另外，加拿大在这一走向独立的进程中，内部的英裔人口与法裔人口为其在独立政治实体中种族的独特性和地位产生着冲突。

魁北克省是一个多元移民聚集地，宗教信仰与政治倾向多元，而且在此时处于经济与政治的变革期，更是加拿大社会矛盾的集中地。魁北克是法裔族群占人口最多省份，大部分说法语的加拿大人都居住此地，使之成为美洲最大的法语族裔人口聚集地。英裔人口在魁北克处于主导地位，法裔人口在争取自治（甚至是独立）的运动，而且由于种族的问题，这里的宗教也呈现着复杂性。新教人口与天主教人口存在着一定的隔阂。另外，此时的加拿大正处于经济格局的转化期，从过去的东西贸易格局（大西洋到太平洋之间）向南北贸易格局（与美国加强贸易联系）过渡。作为过去东西贸易金融中心的蒙特利尔，此时正处于被渥太华取代的过程中。因此，种族、宗教与经济矛盾，使得蒙特利尔成为加拿大各种社会矛盾的焦点。

在考克斯的青少年时代整个世界处于大萧条、大动荡与大转型期。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经济短暂繁荣到大萧条，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的转型、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布尔什维克革命及其世界影响……这一切都影响着加拿大及蒙特利尔。

正是在这种世界、国家和城市变故的复杂环境中，考克斯成长起来。在考克斯成长中首先产生影响的是他的家庭。考克斯的父亲是一个保守党人士，是蒙特利尔金融街——圣·詹姆斯街上一家金融公司的会计。在考克斯 13 岁（1939 年）之前，他父亲的事业比较顺利，这使考克斯家庭从蒙特利尔中下层居住区搬到了上层居住区，也使考克斯在私立学校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甚至在周末校外艺术教育中，考克斯还上过一个由中国人民熟悉的白求恩大夫资助的艺术班。但 1939 年他父亲由于工作不当，造成公司损失，虽然试图借债弥补，但无济于事。这不仅导致其父亲失业，而且使其再不能获得有以前收入水平的职位，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由此急剧变化。恶化的家庭经济状况不仅使考克斯家庭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住在上层居住区，也使考克斯不能像过去那样享受私立学校的良好教育和各种校外的艺术教育。而且，由于父亲的失业与负债，父母关系也由此变坏，父亲为了工作远走渥太华，在加拿大战时价格与贸易委员会工作。虽然父母没有离婚，但两人处于考克斯所说的家庭“种族隔离”状态。考克斯父亲虽然在经济上给考克斯少年生活带来了变故，但在知识层面却给考克斯带来不少教益。

考克斯从父亲家庭系列继承的是知识带来的社会尊重以及后来家道没落的经济窘困。因为考克斯的祖父家庭与他父亲都有这样的经历。考克斯的祖父曾是一位大学老师，后来进入法律界，成为一个较为成功的律师。由于疾病中年去世，去世时给家庭留下了一笔让家人可以体面生活的财产。但由于遗嘱执行者的错误决定，使家庭财产不久“挥发”了。只是由于祖母家庭显赫以及遗嘱执行者的帮助，挽回了一些经济损失。考克斯的父亲后来上了费用较少的皇家军事学院，毕业经过辗转到了蒙特利尔一家金融公司工作。他父亲颇具文学才能，发表过诗作，家中藏书颇多。祖父与父亲在知识方面让考克斯受益良多，少年时他就接触到许多重要的书籍，培养了考克斯的知识兴趣。

考克斯母亲虽然来自一个北爱尔兰移民家庭，但也是一位保守的新教徒，而且是一位对家庭颇具进取心的女性：希望家庭进一步富足，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正是在他母亲的倡议下，考克斯进入收费昂贵的私立学校接受教育。考克斯母亲的家境优越，他的外祖父是蒙特利尔银行的部门经理。母亲有 11 个兄弟姐妹，这个家庭成员之间有较强的凝聚力与忠诚感。家里的亲戚之间走动与联系比较频繁。这种凝聚与忠诚在面对文化上的他者时也表现出一种团结性。所以，这个保守家庭具有较强的爱国主义，考克斯母亲的两个兄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于法国战场。因此，考克斯曾说，他从母亲家族继承的是适度的物质性追求和爱国主义（他母亲家族对英帝国事业忠诚，而考克斯是追求加拿大成为一个不依

附美国的独立国家)。正是母亲家族的这种价值观,在其父亲失业之后,考克斯父母关系发生了变化。一次,考克斯听到其母亲与她妹妹谈话中对其父亲的暗讽,再加上后来母亲对父亲态度,使考克斯对父亲带有一种同情,使他不愿参与“对一个从社会流行的标准来看是不成功的人的排斥”^①。可能正是如此,考克斯后来对自由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

家中落后的考克斯感到了家庭社会地位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宗教的教区活动中,也反映在职业生活中。考克斯个人也由于家庭经济问题只能转到公立学校接受中学教育,并且在课余时间和假期还要做零工,补贴家用。中学毕业后,考克斯1941年进入位于蒙特利尔的加拿大著名高等学府——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但上大学的决定因素是他获得了奖学金,否则,他的家庭是无法承担他的大学学费的。最初考克斯希望大学毕业后从政,但是他的家庭经济状况不容许他学习法律。他入学时学的商科,后来可能是由于学习兴趣,他转向了历史。

在大学期间,考克斯广泛接触社会。一是由于经济原因需要他假期打工,使得其接触到农村、工厂。二是由于他参与政治活动接触到加拿大政治。

接触农村是在1939年,当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许多青年人应征入伍,秋收缺乏人手,政府征召城市青年到农村帮助秋收。考克斯在这一过程中被安排到萨斯喀彻温省参加秋收。按要求一个农场配备一个卡车司机,但是由于司机不够,他与两个同学虽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却一同被指定做卡车司机。考克斯从中开始了解了计划过程的官僚思维。^②

接触工厂是在暑假到工厂打工。考克斯到蒙特利尔北部一个工厂做装配工。几个假期的工作使他了解了不同于他熟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工人,而且了解了工厂中阶级斗争一些情况。如工厂在按工人工作进度设定工作量时,考克斯所在的工组领导通过把所有工人安排到不熟悉的工序中来降低产量,从而保证大家不需要以最大限度工作但却可以获得较高收入。在工厂工作中,考克斯通过一个比他稍大的女工还接触到蒙特利尔的共产党人。通过这个女工,考克斯可能当时阅读了一些共产主义的书籍,还参加过当地共产党人的私下学习。大概是考克斯在学习中的表现出来的自由倾向,不久他被告知不要参加这些会议了。

蒙特利尔当时的政治环境使得考克斯的政治启蒙很早。他10岁时就产生了

① Robert Cox, *Universal Foreigner: the Individual and the World*, London: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2013, p. 32.

② Robert Cox, *Universal Foreigner: the Individual and the World*, p. 36.

政治意识。因为当年保守党人莫莱斯·杜普莱西斯(Maurice Duplessis)联合自由党中一个派别组成的政党——“民族联盟”在魁北克省级选举中击败了长期执政的自由党。这一选举结果使得只有 10 岁的考克斯感受到了周围成年人对不确定的未来的焦虑不安。

作为法裔人口的大省,魁北克自加拿大独立以后就开始了法裔人口的自治运动。由于历史的原因,保守的英裔人口对法裔人口(和天主教徒)都具有一个自以为是的、颇为自得的优越感。英裔人口与法裔人口很少交往。而且法裔人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征兵问题与英裔人口存在着矛盾。这使得少年考克斯出于好奇希望了解这些法裔人口。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蒙特利尔的法裔加拿大人在政治动员上比英裔加拿大人搞得有声有色,经常在广场进行演讲。少年考克斯经常混在人群中听一些法裔加拿大政治人物的广场讲演。这是当地英裔人口中很少出现的现象。在这一过程中,考克斯逐步地增加了对法裔人口为什么要保持民族身份的了解,对法裔加拿大人被压制的地位开始抱有同情。在爱德蒙·伯克的思想影响下,他逐步认为,法裔人口是一个具有务实精神和人文主义精神的保守主义,即他们的政治意识专注于社会连带关系和在一个敌对环境下民族的生存。^①

上大学后,魁北克的民族问题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征兵问题变得尖锐起来。法裔人口的民族主义也由此高涨。考克斯在阅读当地著名法文报纸《责任报》(*Le Devoir*)时,发现了一个支持魁北克民族主义运动的英裔历史学教授戈登·罗思尼(Golden Rothney),两人由于政治倾向相同在后来成了长期朋友。在当时,罗思尼是法裔民族主义政党“民众集团”(Bloc Populaire)支持者。在他的引见下,考克斯结识当时魁北克“民众集团”的领导安德烈·洛朗多(Andre Laurendeau)。由此,考克斯介入了当地的政治。他为罗思尼和洛朗多竞选助力,为两人准备英文演讲稿,向当地的英裔人口介绍“民众集团”的政治主张。洛朗多反对英美主导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民主观以及法裔人口在保持文化独立性基础上与英裔人口共处多元文化观,都给后来考克斯的思想留下了重大印记。可以说,考克斯后来的一些思想最初都受到当时魁北克法裔民族主义中左翼派别——“民众集团”的影响,如多元文明共存的世界秩序、反对政治文化上的帝国主义、反对经济全球化中的新自由主义[他称为极端自由主义(Hyperliberalism)]。

^① Robert Cox and Timothy Sinclair, eds., *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0.

在当时加拿大魁北克以外地区还有一支英裔人口的社会民主力量——“合作共同体联盟”（Cooperative Commonwealth Federation）。但英裔人口中这支社会民主力量与法裔魁北克的社会民主一直没有团结起来。他们都或多或少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是两者都受到不同的文化改造。“民众集团”受到了欧洲和天主教文化的改造，“合作共同体联盟”受到英国劳工运动、美国进步运动、新教社会信条的改造。因此，双方互不理解，没有交集。这也对考克斯后来强调多种文明相互尊重与理解有着一定的影响。

在考克斯青少年时代，对他的世界观产生影响的另一个方面是他的阅读。从中学到大学时代，考克斯阅读不少重要的政治、历史、文学作品，其中一些对他的世界观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其中有上面提到的伯克作品，其他还有 E. H. 卡尔（E. H. Carr）、乔治·索列尔（Georges Sorel）、R. G. 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N. 马基雅维里（N. Machiavelli）、O. 斯宾格勒（O. Spengler）、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的作品。

从伯克那里，如上所言，考克斯接受了一种社会连带主义。但这种社会连带主义已经没有了保守主义的等级成分，考克斯把它与社会主义相联系，认为社会连带是由个人之间相互的义务而形成的社会纽带，而不是自由主义所说的由个人利益形成的社会契约。

青年考克斯几乎读过卡尔的所有作品。卡尔的思想是他最大的思想启蒙。从卡尔那里，考克斯接受了反对自由主义绝对理想化的政治现实主义（《20 年危机：1919—1939》），形成了一种与历史相互结合的现实主义观。从卡尔的《民族主义以及以后》中，他知悉了 19 世纪到 20 世纪之间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因素与政治结合对结构变化的影响；认识到个人、国家和世界是联系的，研究世界不能把各个分析层次孤立起来，具体事件或运动的产生有着更深刻的社会背景。正是这种多层次的结构分析观，使考克斯工作后阅读了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和一些法国年鉴学派（the Annales school）作品。布罗代尔的不同结构时长的思想，如事件时间（event time）、变革时间（conjunctural time）和最基础结构长时段等观点，对他后来认识世界、国家和社会的不同结构的变化影响很大。而且，由于卡尔这个“红色教授”（倾向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色彩，考克斯从他那里，接触到俄国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作品以及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等人的思想、布尔什维克革命、历史发展的多元因素论。

考克斯的现实主义世界观的另一个源头大概是马基雅维里。在大学时代，考

克斯读过一本《马基雅维里主义者》(*The Machiavellians*)。从这本书中,考克斯从作者那里知道了权力的内在机理和国家之谜,“以简单的‘民治’意义的民主在社会学上是不可能的。人们必须了解所有大的组织,包括国家在内,都是由精英统治的。为了使臣民和被压迫者要保持一定的首创性,重要的是人民要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在这个意义上,考克斯认为,马基雅维里主义者是“自由的保卫者”^①。这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马克思对马基雅维里的评价:“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从理性和经验出发,而不是从神学出发来阐明国家的自然规律。”^②

索列尔作品也是青年考克斯阅读最多的作品。从索列尔那里,考克斯了解社会心理与社会物质环境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接受了索列尔关于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历史发展是不可预测的,意识具有重大的反作用的观点。用考克斯的话说,“没有激情什么都无法实现”^③。这是考克斯在接触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著作之前,最早阅读到关于主观能动性在社会和历史发展中可以发挥促进作用的作品。可以说,正是索列尔的铺垫,才导致后来考克斯接受了葛兰西许多思想,也是考克斯后来批判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经济决定主义的观点。但在当时,索列尔的作品唤起了他对人类事务研究上的实证主义和伪科学的怀疑。由于索列尔的社会民主党渊源,考克斯也接触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索列尔的结构主义后来无疑也对考克斯的“历史结构”有着重要影响。

从阅读柯林伍德的作品中,考克斯学会了如何学习历史。学习历史就是理解历史,不是从过去收集数据,也不能把历史作为一种线性式的、通往某种终结目标的机械过程,而是要理解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心理特征以及它的产生环境,理解这种社会心理是如何引导人们行为的。用考克斯的话说,“思想是一种理解各种物质、文化和意识形态共同影响塑造历史的切入点”^④。这种观点与索列尔的主观能动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很相似,但这种对思想的强调并不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把所有的历史都看成是思想的产物,有点类似历史唯物主义中所谈的由社会环境产生的主观思想。柯林伍德与索列尔这种强调社会结构中的主观因素都对考克斯后来接受葛兰西的主观革命论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柯林伍德的著作也是后

① Robert Cox, *Universal Foreigner: the Individual and the World*, p. 39.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7页。

③ Robert Cox and Timothy Sinclair, eds., *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p. 27.

④ Robert Cox, *Universal Foreigner: the Individual and the World*, p. 38.

来考克斯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后去读 G. B. 维科 (G. B. Vico) 的重要原因。从维科那里,考克斯确认了存在着与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研究不同的历史主义方法。

另一本对青年考克斯有着重要影响的著作是斯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Decline of the West*)。在这一本书中,吸引考克斯的不是斯宾格勒的西方文明进入最后阶段的悲观主义,而是斯宾格勒在书中展示出来的“文化的所有方面的相互联系、数学与建筑的联系性、政治与性的联系性”^①。这种普遍联系的观点与上述卡尔·索列尔、柯林伍德谈到的整体的社会观都有一定的联系。

虽然考克斯从没有提到他在青年时代专门阅读过马克思的书,但其从卡尔·索列尔那里无疑是接触到某种历史唯物主义。而且这种注重主观能动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机械式”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有着一定的区别。这对考克斯后来从有机的而非机械的观点认识世界秩序并谋求改造是最早的启示。

可以说,考克斯青少年时代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有关历史变革及其背后的原因,什么是结构变革的施动者,施动者的思想状态及其产生的结构背景之类的著述对他影响很大。这也是时代在他心里的反映。另外,作为家庭背景和民族社区的“异类”,他也特别爱读一些描写孤独者的作品,比如考克斯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中“梅什金王子”是孤独者的偶像。

二 国际劳工组织的官员

1947 年考克斯从麦吉尔大学硕士毕业后进入国际劳工组织 (ILO) 当低级公务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为国际劳工组织逃避战乱而迁到加拿大,正好“借宿”在麦吉尔大学。由于考克斯具有英法双语优势,成绩优异,在大学期间是政治活跃分子,并且曾经在英国驻美国大使馆打工,加之其他一些社会关系,这是他被国际劳工组织招募的优势条件。

战后随着这一组织迁回日内瓦,考克斯 1948 年也到了日内瓦,并在这一组织中总共工作了大约 25 年。考克斯当时之所以愿意到欧洲工作,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想从被边缘化的环境中找到一个解脱的机会。因为他的政治观点已经与当时加拿大英裔社会环境所接受的一切格格不入,因为他同情魁北克法裔人口的民族主义运动;二是因为他具有两种文化背景和了解两种不同文化是怎样看待世界的经历,他认为这对在联合国体系 (ILO 战后属于联合国体系) 内工作具有

^① Robert Cox, *Universal Foreigner: the Individual and the World*, p. 38.

优势。

在国际劳工组织中考克斯先是在行政办公室做低级公务员，处理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关系。他的直接上司是克拉伦斯·詹克斯（Clarence W. Jenks）。他当时是国际劳工组织的法律顾问，在行政办公室负责国际交流，后来成为国际劳工组织的总干事（1970—1973 年）。此人在战后国际劳工组织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詹克斯把他的世界观带入了国际劳工组织，这是一种全球主义观，即通过一个扩大的国际法网络把各国的独特性融入不断发展的全球治理体制中。^① 在詹克斯手下工作，考克斯感到詹克斯对其追求的事业有一种自以为是的态度，认为他的政策是正确的，是为了改进人类社会，但他不知道理解其他人的思想（尊重他人）。詹克斯这种绝对理想主义的世界观（E. H. 卡尔所描述的“乌托邦主义者”），很快就使起先崇拜他的考克斯不适应，因为他要求他的手下绝对忠诚于他的事业，而考克斯持一种来自卡尔的务实与相对主义的世界观。虽然詹克斯在国际劳工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中有许多崇拜者，无疑也是一个魅力性的政治人物，但考克斯与他相处并不轻松。正是在詹克斯手下工作，也使考克斯最初看到了一些国际组织官员所具有的普遍性（universal）思维。

在日内瓦生活过程中，考克斯也见证了日内瓦（甚至整个瑞士）对外国人的等级式对待。日内瓦有两类外国人，一类是有特权的外国人，包括外交官、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的雇员；另一类是处于弱势的外国人，他们是在工作许可中有许多限制的外来者。但两者都处在瑞士的控制监视之下。后者从事一些有钱人不愿从事的工作，如果必要时，这些人不能待在瑞士。在日内瓦生活，考克斯还发现一种现象：一些民族喜欢与本民族的人聚集在一起。美国人一般是通过正式的社交场合聚集，法国人通过非正式的网络联系，而加拿大人则不喜欢聚集起来。考克斯曾经想把当地居住的加拿大组织起来，但是没过多久就失败了。考克斯猜测这可能是由于当时加拿大人之间存在着领导权竞争，也可能是人们不感兴趣，也恐怕是加拿大人在文化上是向外看而非向内看的。当地的加拿大人往往习惯同外国人交朋友。从这一经历中，考克斯比他在魁北克发现了更大的民族差异性。这与他后来提出的世界秩序以多元民族相互尊重为基础相关。

1948 年国际劳工组织选举美国人戴维·莫尔斯（David Morse）为总干事。这改变了过去欧洲人主导国际劳工组织的局面，这也是美国主导战后国际秩序的体现。但是，莫尔斯作为罗斯福新政时代的美国官员上任后的第一个工作就由于

① Robert Cox, *Universal Foreigner: the Individual and the World*, p. 61.

冷战而夭折。莫尔斯上任积极配合美国把国际劳工组织工作转向具体的战后重建工作。莫尔斯第一个工作是移民工作。他打算在移民问题上配合马歇尔的帮助欧洲重建计划。这一计划设想是从“劳动力过剩”的欧洲移民几百万人到北美、南美和澳洲，这其中包括 150 万难民和无家可归者。国际劳工组织的工作就是为移民的遴选、运输、培训和安置制订计划并组织实施。但这一工作随着冷战的发展遭到美国和苏联的反对，美国担心移民过程中的共产主义渗透，而苏联要求难民回到母国而不是移民他国。最后美国联合欧洲一些国家成立“欧洲移民跨政府委员会”负责这项工作，以便于美国的直接控制。这一工作的失败对一心与美国对国际组织思维保持一致的莫尔斯是一个打击。莫尔斯原来希望按照美国对国际劳工组织的要求国际劳工组织以一种独立的面貌进行工作，体现一种普遍主义。但这种设想在冷战中没有得到美国的支持。后来类似的事件在莫尔斯任上发生过多次，以致他主要与美国的一些政治势力斗争。在这一项计划中，考克斯作为低级官员虽然没有参与多少，但此事和以后经常出现的国际劳工组织与美国的矛盾使考克斯对国际劳工组织运作内在困境有了深入了解。

1952 年正在考克斯对在国际劳工组织中的工作感到无聊，准备回加拿大重找工作时，莫尔斯决定把他纳入他个人的“内阁”成为他的主要行政助理，使他继续留在国际劳工组织。

成为莫尔斯个人“亲信”后，考克斯可以近距离地观察这位国际组织的首脑，体会莫尔斯强烈的普遍性思维，体验国际劳工组织的运行。莫尔斯从没有把其作用置于具体的政策领域，而是希望作为一个国际组织首脑以一个普遍性的角色介入世界的所有冲突。在阿以冲突中，他的这种愿望表现最为突出。莫尔斯是犹太人，虽然他对以色列抱有个人情感，但从不公开流露，并与埃及纳赛尔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希望作为国际组织首脑以一个普适性的立场来调解阿以冲突。在第二次中东战争中，考克斯跟随莫尔斯到访中东各国，也使他接触到中东各国的国情和复杂的政治社会状况，了解了当时错综复杂的文明冲突，这使他观察到了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文明。

后来，考克斯跟随莫尔斯访问南亚各国，也使他认识到南亚各国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和文化传统。再后来考克斯担任国际劳工组织项目和规划处领导，以及担任国际劳工组织内部的国际劳工研究所所长，这使他有机会访问更多的国家，如拉美、苏联和东欧国家，比较深入地了解一些国家的社会发展与变化状况，工会组织与发展状况，生产组织过程中的社会生产关系。这使得考克斯后来在研究国际政治经济上比只有书斋经历的学者有着无法比拟的优势。他不仅看到了不同

国家的工人运动与政治发展状态, 以及其背后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的原因, 而且体会了不同国家的民族文化心理, 形成了一种多元的世界印象; 同时, 通过这种世界性游历, 考克斯也感到, 国际劳工组织一些源于西方国家的“一刀切”普适主义的做法并不适应一些国家的国情。这使得从过去青年时代获得的相对主义思维变得更加具体, 更加巩固。这对他后来思考世界秩序中普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相互关系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国际劳工组织 25 年的工作经历, 使考克斯亲身体会了冷战中国际劳工组织生存过程中的政治斗争以及这种政治斗争对国际组织所要体现的“普遍性原则”产生的破坏作用。这种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 (1) 美国对普遍性原则的破坏。莫尔斯来自美国, 必须获得美国的支持。但他的国际组织普遍性思维(接纳苏联与东欧国家参与国际劳工组织活动)以及新政时代官员的特征, 使他经常受到美国国内劳工运动中冷战强硬派的攻击, 指责他“对共产主义软弱”, 还受到美国国内商界的反动势力攻击, 指责他是“渐进的社会主义”(creeping socialism)。这使得在莫尔斯领导的国际劳工组织所要体现的普遍原则经常受到掣肘。(2) 西方国家集体对苏联东欧国家的抵制形成的破坏作用。作为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必须容纳苏联与东欧集团, 但在国际劳工组织中由于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 能形成投票的多数, 他们经常以排他性的、反共的“三边主义”(国家、工会和资方共同参与)口号来排斥苏联与东欧国家。(3) 国际劳工组织内部的“封建式”分封制官僚模式的冲击。在国际劳工组织中各构成部门属于一个“男爵式官僚领导”, 形成了各个部门自己的独特性, 这对国际劳工组织要实现与维护计划的协调性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特别是一些主管领导来自不同的国家(国际劳工组织主要在四大国——美英法苏), 更是造成工作的协调困难。^①

但是, 考克斯在国际劳工组织随着他“不合规矩”的思维逐步地变成了“另类”, 又一次成为他生活环境中的“异类”。1964 年考克斯利用休假在日内瓦大学研究生院教了一年书, 其间写了一篇“行政首脑: 论国际政治组织的领导权”的论文(它后来发表在《国际组织》1969 年春季号上)。这一论文对国际组织首脑在一个分裂的无政府国际体系中如何创新国际组织的作用, 逐步把国际组织变成一个超国家的全球治理机构, 推动国际体系的整合进行了政治分析。在论文中, 考克斯提出了行政首脑为实现这一目标应具备怎样的个性和政治素

① Robert Cox and Timothy Sinclair, eds., *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pp. 21 - 22.

质，如何在国际组织内部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国际公务员打交道，如何与各国打交道……^①这一论文可以说是考克斯作为高级国际公务员依据其在国际劳工组织经历比照一些国际组织成功与失败的经验进行的现实主义的权力分析。因为这一论文的题目据考克斯说都来自马基雅维里《君主论》。这篇论文立即在国际劳工组织内闹得沸沸扬扬。因为在国际组织中存在着表面的道德理想主义，这篇论文也触动了“国际组织的意识形态的原始神经”。国际劳工组织中的批评者（主要是来自西方国家阵营中的工作人员）认为他是一个没有道德的马基雅维里式的民粹主义者，批判他“亵渎了圣地”，对他的人品表示出怀疑。由于他是总干事莫尔斯的亲信，与莫尔斯有着大体相同的世界观，在“老板”的庇护下，这一论文并没有影响他在国际劳工组织的地位。此后，考克斯调入了由他创建的国际劳工研究所，不久担任所长（相当于助理总干事的职位）。并且莫尔斯给予这一研究机构在研究上独立权，不受国际劳工组织已有的陈规观念束缚。

1971年考克斯发表了第二篇在国际劳工组织中“得罪人”的文章。考克斯以化名 N. M.（以马基雅维里 Nicolas Machiavelli 名字首字母开头）在美国《外交》期刊当年春季号上发表了《危机中国际劳工》。在这篇文章中，考克斯提出由于整个世界变化，以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劳工组织面临着巨大危机。因为它不能适应苏联与东欧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的重要力量，不能适应发达国家内部的非工会工人的需求以及社会对公共产品质量的要求，不能适应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参与权以及发展的要求和它们国内工人、政治和雇主关系状况的要求，也不能应对正在兴起的生产全球化产生的社会问题。因此，国际劳工组织面临着生存的危机，要摆脱这种危机，国际劳工组织就必须在目的上、运作模式上、工作重点上和人员上进行结构改革，增加其自主性、普遍性和深入介入上述问题。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不能短视，沉溺于反共，应当积极主动，支持国际劳工组织的改革。^②考克斯这篇论文的发表再一次引起了国际劳工组织内部的争议。但这次没有得到劳工组织的首脑的支持，当时的总干事詹克斯对此非常不满。虽然这篇文章是以匿名发表的，但考克斯作为头号怀疑对象被认为是作者。詹克斯要求今后所有劳工组织的官员发表与工作相关的著述必须得到他的批准。但考克斯认为这是詹克斯对研究所独立工作的干预。这样他与詹克斯个人矛盾开始升级。

① Robert Cox, "Executive Head: an Essay on Leadership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Robert Cox and Timothy Sinclair, eds., *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pp. 317-438.

② N. M., "International Labor in Crisis," *Foreign Affairs*, no. 2, 1971, pp. 519-532.

过去詹克斯曾作为考克斯的直接上司,两人存在哲学观和个性上的差异,考克斯就对他敬而远之。后来考克斯成为莫尔斯的“亲信”,由于莫尔斯与詹克斯的关系不佳考克斯也与其关系不密。更重要的是,1970 年莫尔斯辞职,但竞选总干事过程中,考克斯在加拿大政府和一些劳工组织高级官员的鼓动下被动地成为竞争对手。虽然考克斯最终没有参加正式的竞选,但他与詹克斯结下了个人恩怨。这种个人恩怨随着詹克斯的当选不断恶化。最后发展到考克斯不得不辞职。具体原因是考克斯利用休假与密歇根大学的哈罗德·雅可布森(Harold Jacobson)合作编著了由一些著名学者共同撰写的《影响的解剖:国际组织的决策》(*The Anatomy of Influence: decision making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此书1975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在出版前,考克斯把有关内容向詹克斯作了汇报,但声称这只是为了让詹克斯知道信息,而不是为了寻求他的批准。结果,詹克斯不允许考克斯出版此书。这导致他愤而辞职,到哥伦比亚大学担任政治学教授。多年来考克斯对詹克斯的做法耿耿于怀,认为他“不是一个可以用文明方式就他们之间差异进行对话的人”^①。

三 大学任教后的学术研究生涯

考克斯虽然在国际劳工组织任职时一直就有回到学术界进行学术研究的想法,但每一次都由于各种原因而没有实现。在20世纪50年代末,他得到洛克菲勒基金资助到伦敦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也由于工作的需要没有成行。20世纪60年代到他从国际劳工组织辞职前,有许多美国和加拿大著名大学给他优厚的待遇聘请他,也是由于种种原因与工作前景的吸引没有入职。甚至在他辞职前,曾接受了哥伦比亚大学聘请后又毁聘。1972年辞职进入哥伦比亚正式全职进行学术研究可以说是考克斯长期以来的心愿,虽然在一开始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考克斯全职进行学术研究是有基础的。在担任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研究所所长的那些年,考克斯在学术界积累了大量的人脉。他和许多政治学家成了“兄弟”,这其中主要是美国学者,也有一些英国、德国与法国学者。因为考克斯利用职务之便邀请这些学者来日内瓦国际劳工研究所进行交流与研究。同时,由于考克斯的这一身份,他也经常受邀参加许多学术会议,到英国、美国、法国

^① Robert Cox and Timothy Sinclair, eds., *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p. 24.

和加拿大许多大学进行讲学与访学交流。在他辞职前，由于这种外出交流的频次太多，以致当时担任总干事的詹克斯发牢骚，认为考克斯不能成为“缺席的地主”（absentee landlord）。正是在国际劳工组织担任国际劳工研究所所长积累的经历以及由此积下的人脉，使他在入职哥伦比亚大学后很快地就融入了美国相关的学术网络中，并经常组织和参加一些学术活动。

今天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熟悉的美英老一代学术“大咖”都与考克斯有着或多或少的学术交往，如美国新功能主义的创建者、著名的《超越民族国家》的作者厄内斯特·哈斯（Ernst Haas），美国最著名的国际组织研究者、《化剑为犁》的作者英尼斯·克劳迪（Innis Claude）；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创建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考克斯与她后来成为终生的最好的朋友）。包括后来在美国大名鼎鼎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等人都曾与考克斯有过一定的学术交往。如约瑟夫·奈参加过上述“影响的解剖：国际组织的决策”项目，基欧汉曾在著名的《国际组织》期刊编委员会担任编委并做具体的编辑工作，而考克斯此时是《国际组织》编委会主任（考克斯曾两度担任《国际组织》的编委，1969—1975年，1979—1980年，在后一个时期他接替厄内斯特·哈斯坦任编委会主任）。

在大学从事学术研究过程中，考克斯的学术思想也有一个转变的过程。从实证功能主义者转变到历史哲学的批判主义者。考克斯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这一段早期，他是后来被本杰明·科恩（Benjamin Cohn）称之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美国学派的“同路人”。因为当时美国的学者都转向了“科学主义”的方向，考克斯也开始“入乡随俗”。并且他早期的学术著述如上述提到的《行政首脑》《影响的解剖》都带有结构功能主义方法论。但是，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是他后来称为“解决问题”的理论方法，这与他青年时代的历史哲学的学术训练不太相契合。更重要的是，它与考克斯对世界的认知有着较大的差异。考克斯自己认为，1968年世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法国的“五月风暴”、美国的民权运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预示着整个世界开始了一场结构性变革，后来世界发生的重大事件在不断地促进这种变革，冷战后建立的霸权不论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在经历着挑战。这一切以及他个人在国际劳工组织的经历促使他逐步脱离功能主义方法，在20世纪70年代转向他学生时代就接受的历史模式的思维以及维科和马克思的批判思想。这一转变整整经历了10年，到1981年和1983年他那两篇著名的论文（《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葛兰西、霸权和国际关系》）在《千禧年》（*Millennium*）发表时才彻底完成这种转变，形

成他完整的思想体系。^① 在这一过程中, 他从哥伦比亚大学转到了加拿大多伦多的约克大学 (York University)。

在他回加拿大工作的过程中, 约翰·霍尔姆斯 (John Holmes) ——这位曾经的加拿大著名外交官, 后来担任加拿大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加拿大国际研究学界的著名人物——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于 1977 年致电考克斯, 请他考虑回加拿大任教。考克斯感到这一次如果再不接受邀请将不可能再有回加拿大工作的机会。这使得考克斯在离开加拿大 30 年后彻底回归加拿大。促使他“落叶归根”加拿大的其他原因, 除他在美国的移民身份与工作任期不契合, 以及他不喜欢所居住的环境 (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商业公司高管居住区, 这与他以前习惯居住的日内瓦国际社区区别很大) 外, 很可能主要还是美国大学的研究氛围与考克斯的研究取向与学术趣味不同。因为他认为, 回加拿大任教的约克大学政治系是一个活跃而年轻的系, 是一个兴趣相投的学术之家。最后一个吸引他回加拿大工作的原因是魁北克的自治政党“魁北克党”在 1976 年省级选举的胜利。这一胜利重新燃起考克斯青少年时代对魁北克政治的兴趣。这种兴趣甚至使他在 1981 年魁北克主权公投时到魁北克市的拉瓦勒大学 (Laval University) 教了一个冬季学期的书^②, 以便近距离地参与这一选举。

考克斯的这种转变, 除与他在青少年时代的教育和经历有关外, 也与他在任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研究所所长时组织所内的一个课题研究有关。这一项目调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世界各地的生产关系 (当时称为产业关系 industrial relations), 去发现整个“劳动”世界中社会生产关系格局的多元性, 以及社会生产关系的特征, 目的是由此发展一种“概念框架, 以此能理解社会结构的变革”, 去发现社会变革的刺激因素, 并以此来发现国际劳工组织在这种多元而变化的“劳动世界”中怎样面对挑战, 使其在促进世界变革中重新在整个世界发挥重要作用。这一课题的基本设想在上述提到的考克斯以化名 N. M. 在《外交》上发表。

这一课题随着考克斯辞职中止了。考克斯任教后又把这一课题重新拾了起来。这一课题原准备出版四本著作: 第一本由考克斯撰写, 主要是尽可能结合具体历史形势设计出理论框架; 第二本是涉及不发达国家和处于发达国家边缘的未受保护的工人状况, 由考克斯在研究所的同事杰里·哈多德 (Jeffery Harrod) 撰

① Robert Cox and Timothy Sinclair, eds., *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p. 26.

② Robert Cox and Timothy Sinclair, eds., *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p. 30.

写；第三本是涉及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关系；第四本是涉及发达国家常规的劳动生产关系。后两本没有分配给具体人写。正是在组织这一课题的研究过程中，考克斯越来越感到美国主流的学术研究氛围与这一课题的研究不相适应。因为美国主流的学术氛围是一种维护现状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与方法论更适用于设计这一课题的理论框架。历史唯物主义与考克斯在青少年时代获得的知识结构更易衔接，更适用于促进社会变革的研究。

正是在这一课题的研究过程中，考克斯在 1981 年发表了《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作为整个课题研究的理论框架。论文中的思想是考克斯 20 年思考的结晶。这一文章在他的终身好朋友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的鼓励和建议下得以发表。最初这一论文是在美国的国际研究学会（ISA）年会上宣读。斯特兰奇听后建议把文稿寄到伦敦经济学院《千禧年》编辑部，但编辑们并不看好这一论文，对论文做了彻底的批判。在斯特兰奇的支持下，考克斯对批判做了一一回应后才得以发表。可以说，该文中提出的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理论框架是考克斯学术研究的最大理论创新。他创立了一种全新的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他后来做的研究大体上都是在这一框架下进行的。这一论文后来成为国际关系中的经典，翻译成多种文字^①，得到广泛传播。直到 2006 年文章发表 25 年后，《千禧年》编辑还告诉考克斯，许多人还在索求文章。正是这篇文章使得考克斯被归入“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也奠定了他国际关系学界重要思想家的地位。

1983 年在《千禧年》发表的《葛兰西、霸权和国际关系》一定程度上是考克斯研究这一课题的方法论。他把葛兰西的一些重要思想与概念引入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虽然考克斯后来不太赞成有人把他归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葛兰西学派代表人物，认为重视思想观念作用的学者在葛兰西之前就存在，是欧洲的思想传统的一支。但是，他后来的研究，特别是对世界秩序变革的研究许多是与葛兰西一致的，如他强调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国际层面的公民社会是促进变革的重要力量，观念变革是促进人们行动去变革世界的先决条件。所以，把考克斯视为国际政治经济学葛兰西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正是葛兰西这种强调主观先行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观被考克斯应用到国际政治经济学，应用到如何改造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中，形成了他的理论框架的独特性。

考克斯领导与参与这一课题研究的最终作品是 1987 年出版的《生产、权力

^① 中文版收录在《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一书中。

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塑造历史中的作用》一书。这是用上述的理论框架与方法结合 19 世纪以来的历史，分析生产、生产关系的变化对塑造世界秩序上的作用的专著。这是考克斯第一本个人专著。在这本书出版过程中，斯特兰奇作为书的审阅者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能标志着对国际事务感悟起转折点作用，并能成功地向全新方向重新引导思想与观点的书，是凤毛麟角的。公正地说，这本书算是一本，尽管这本书不太容易读”^①。这本书出版时，由于西方处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期，人们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作用开始有所感受，因此此书也非常畅销，并译成多国文字^②。可以说，这本书更全面地应用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方法与观点阐述了世界秩序变革的内在动因。只要读过马克思与恩格斯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再读一下这本书开头的“主题”，就会感受到书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生产创造了社会存在所有形式的物质基础。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共同努力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包括政体。生产产生了发挥权力作用的能力，但权力也决定着生产发生的方式。”^③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谈到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具有反作用”换了一种表达方式吗？书中坚持的生产过程中的阶级（斗争）分析与一些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谈历史唯物主义脱离了生产，否定阶级（斗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尽管考克斯不愿被人贴上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可能是出于生活在西方社会的考虑），但他思想中的这些因素很难与马克思主义相剥离。

考克斯大学任教期间第二个研究的方向是文明与世界秩序的关系。在 20 世纪末，由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在世界受到广泛关注。关注世界秩序发展与变革的考克斯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认为，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文明成为历史的最终文明形态，或新自由主义世界性发展必然导致美式文明与其他文明（主要是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冲突，都是以未来的世界秩序以美式文明统一天下为基础的，既违背了历史辩证法，也与世界的现实和西方自身的文明观念史相违背，而且会导致一个灾难性的世界秩序前景。因此，在结合一个联合国的多元文明研究项目，他开始进行“文明与世界秩序”的研究。这一研究更多地带有一种规范性特征。虽然，考克斯对文明的研究没有建立在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而是

① Robert Cox, *Universal Foreigner: the Individual and the World*, p. 233.

② 中文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年出版。

③ Robert Cox,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 social forces in the making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Theme*, p. 1.

建立在社会文化基础上,更多的是把文明看成一种文化现象,但是其中的物质条件仍然是与社会生产相联系的。这从他对文明的定义可以体现出来,“文明的一个可行定义可能是存在的物质条件与主观共识(inter-subjective)意义的契合或对应”^①。考克斯认为,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文明作为一种比国家更大的文化载体,具有比过去的阶级与民族更大的身份认同。国际关系研究在当今更主要是一种文明之间相处之道的研究。考克斯在这一研究方向产生的最大研究成果就是2002年出版的《多元世界的政治经济学:对权力、道义和文明的批判性反思》。考克斯在这一研究提出的最大思想是,文明的共存与对话是决定未来世界秩序是一个多元文明和平共处相互借鉴还是灾难性冲突的关键。在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着共同的生存危机与挑战,文明共存与对话存在着物质与社会基础。在阅读了考克斯关于文明与世界秩序的研究作品后,中国学者会感到其中的许多思想与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有着相当大的契合性。同时,中国学者还感到其中的一些观点与中国学者近年来提出的“关系理论”和“共生理论”有着相当大的近似性。

在西方,关于考克斯的思想与理论系统性评述最重要的专著是安东尼·莱森(Anthony Leysens)所写的《罗伯特·考克斯的批判理论》(*The Critical Theory of Robert W. Cox*)。这是唯一一本专门研究考克斯理论与思想的专著。^②2016年考克斯90岁时,《全球化》期刊当年第5期专门出版了一期关于考克斯学术的研究专集。^③虽然,没有使用专集这一词,这一期收录的12篇文章中有10篇对考克斯的理论与思想做了重要的分析(另2篇是应用考克斯的理论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这些论文对考克斯的理论与思想从学术上有褒有贬,以褒为主。除此之外,在考克斯70岁从约克大学退休时,为纪念他的学术成就,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论文集《世界秩序研究》(*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在这本论文集开始部分,他的学生提摩太·辛克莱(Timothy Sinclair)写了一个概览,对考克斯的学术成就做了重要的评述。另外,在考克斯2002年出版的《多元世界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Plural World*)中,他的学生迈克尔·谢克特(Michael Schechter)所写的第一章“考克斯理论的批判:从背景到

① Robert Cox and Michael G. Schecht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Plural World: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wer, morals and civi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2, p. 161.

② Anthony Leysens, *The Critical Theory of Robert W. Cox: Fugitive or Guru*,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③ 参见 *Globalization*, vol. 13, no. 5, 2016。

对话”中，把各种对考克斯理论的正面/负面性评价、赞扬/批判的观点集中地展示出来，并让考克斯对负面的观点进行回应，从中也可以看到西方学术界对考克斯思想与理论的研究状况。

西方学者对考克斯理论与思想的研究以及所做出的评价，由于研究者意识形态的倾向，可谓是泾渭分明。右翼学者可以说对考克斯的思想嗤之以鼻，不屑一顾。最典型的如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他认为，考克斯的代表作《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一个完全失败的作品，他对辩证法的应用没有实质意义，与“过时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大区别，其中融入的“剩余价值”、“阶级”和“霸权”的概念，我们过去都见过。^① 这种观点显然是受意识形态影响太大，已经不能起到真正客观地评价考克斯思想与理论的作用。

相反，一些左翼学者对考克斯的理论 with 思想推崇备至，把它视之为葛兰西主义在国际研究中的开创者，是国际关系研究理论的创新者和改造者。如在斯蒂芬·基尔（Stephen Gill）所编的《葛兰西、历史唯物主义和国际关系》（这是一本葛兰西主义学派主要人物代表性论文的合集）一书中，基尔在其所写的“葛兰西和全球政治：通往后霸权的研究议程”和“认识论、本体论和‘意大利学派’”两篇论文中，对考克斯在这一学派中的学术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考克斯的作品（1981 年的“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1983 年“葛兰西、霸权和国际关系”）是把葛兰西思想引入国际关系中的开创性作品，并指出考克斯在 1983 年所写的“葛兰西、霸权和国际关系”和 1987 年所写的《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中把葛兰西所创立的一些概念引入国际层面并发展出自己的概念工具和本体论。^② 基尔这两篇论文，对考克斯理论以及方法论有着深入的诠释，对理解考克斯理论有着极其重要的引导作用。

① John Adams, “Review of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vol. 501, 1989, pp. 224–225.

② Stephen Gill, ed., *Gramsci,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4.